

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

鄧聲國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

鄧聲國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/鄧聲國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6.4

(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)

ISBN 7-5325-4259-9

I. 清... II. 鄧... III. 儀禮-文獻-研究-中國-清代
IV. K892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28283 號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

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

鄧聲國 著

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

上海印刷四廠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7.25 插頁 5 字數 420,000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800

ISBN 7-5325-4259-9

K·794 定價: 49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 T: 59886520

作者簡介

鄧聲國，1969年6月生，江西上饒人。1995年考入南昌大學中文系，師從黃新光先生攻讀漢語史專業研究生，1998年6月獲文學碩士學位。2001年考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，師從馮浩菲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，2004年6月獲文學博士學位。現為江西科技師範學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所教授，中國詩經學會會員、楚辭學會會員、中國民俗學會會員、江西邊緣法學研究會副會長。主要從事古代漢語、古典文獻學以及傳統經學研究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。已出版學術論著《清代“五服”文獻概論》，并在各種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四十餘篇。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（第一輯）

- 一 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
- 二 秦制研究
- 三 魏晉南北朝文體學
- 四 李燾事迹編年、著述考辨及詩文輯存
- 五 杜詩釋地
- 六 關中方言古詞論稿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（第二輯）

- 一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
- 二 秦漢人物散論
- 三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
- 四 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
- 五 宋代文獻學研究
- 六 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

山東大學“985工程”二期資助項目

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出版說明

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以聞一多、梁實秋、楊振聲、老舍、沈從文、洪深等爲代表的著名作家、學者，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以馮沅君、陸侃如、高亨、蕭滌非、殷孟倫、殷煥先爲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研究，以丁山、鄭鶴聲、黃雲眉、張維華、楊向奎、童書業、王仲華、趙儷生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，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。但是，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，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，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。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。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。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，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，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。

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，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、中國古代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、史學理論與史學史、中國古代史、科技哲學、文藝學、民俗學、中國民間文學等。主要從事科研工作，同時培養碩士、博士研究生。知名學者蔣維崧、王紹曾、吉常宏、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，成爲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。

興滅業、繼絕學、鑄新知，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；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，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，是本院工作的重中

2 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研究

之重。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正是爲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。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，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。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
2003 年 10 月

序

馮浩菲

在華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，《儀禮》是相當難讀的一部分。它主要記述先民們冠、昏、飲、食、燕、射、聘、覲、喪、虞等方面的禮節儀式，所涉及到的服飾搭配，禮器陳設，贊幣等次，言辭容止，主、相、賓、介、門、階、面、位、升、降、進、退，揖、讓、興、獻、薦、祭、啐、歌、笙、間、合等等繁文縟節，不辨則不通，辨之又不暇辨。在多數學者看來，瑣細糾結，枯燥乏味。故相對而言，歷來傳習者較少。但它畢竟是我國為數不多的古老典籍之一，為諸多禮制之遠源，凡研究三代以上歷史、社會、民俗之學者又在必讀之列。清代是《儀禮》研究的鼎盛時期。《中國叢書綜錄》之《儀禮類·傳說之屬》不計重複，共收書 53 種，其中由漢至明僅 12 種，有清一代竟達 41 種，為前者的三倍之多。這雖然只是一個很有限的統計數字，但也能說明這個問題。清代的《儀禮》研究是全方位展開的，大概除了在注體上沒有人能跟鄭康成的《儀禮注》競高下之外，在其他各個方面，清人的研究却能超過前賢。

《清代〈儀禮〉文獻研究》一書是鄧聲國博士的博士學位論文。瞭解了以上簡單情況之後，就會知道，這本書的選題難度較大，但具有重要意義。在目前情況下，年輕的博士生敢于選做這

一類難度較大的課題，確實令人鼓舞；更感欣慰的是，在讀博期間不長的時限內，他如期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任務，而且完成得相當不錯，頗有水平。

粗略地說，這本書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
首先，從寫作體式上看，該書的研究對象不是《儀禮》原文，而是有清一代以《儀禮》原文為研究對象所產生的一切論著，亦即其《緒言》中所說二次以上的《儀禮》文獻。換句話說，該書是從文獻學的方方面面入手，觀察、研究、論述清代所出現的《儀禮》文獻的一部專著。這種學術角度和結構模式，在《儀禮》研究方面前人很少採用，因此具有原創性，意義不小。倘推廣開去，它可以運用於各種典籍文獻的研究中，將會引導出無數同類而有意義的著作。

其次，從內容上看，該書對清代《儀禮》文獻既有全面關照，又有重點剖析。前者如對清代《儀禮》研究藉以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分析介紹、對清代《儀禮》研究三個階段的劃分和論述、對清代《儀禮》研究七大流派的區分論證、對清代《儀禮》研究中一些基本問題的歸納討論，等等，大致概括全面，區分有理，論證得力，觀點鮮明，多有創見。後者，即重點剖析的例子，如對清代“五服”文獻的研究、對清代《儀禮》文獻之訓詁體式、訓詁方法、校勘的專章討論，等等，大致分析細密，挖掘深刻，論列詳明，證據充分，結論可靠。總之，點面結合，論述效果較好，看後使人對清代《儀禮》文獻既能有全局性的印象，又能有方方面面的重點瞭解。

再次，從學風上看，該書各章各節各條所論述的各種問題，所得出的各種結論，都以大量的、有代表性的文獻資料為基礎。也就是說，重證據，不尚空談。

還有，從學術的時代性上看，雖然研究、論述的對象屬於古

典文獻，使用的是高度專業化的術語，但觀點新穎，與時俱進，語言清新、流暢，富有時代特徵，沒有陳腐味，可讀性強。

我在為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講授《文獻學理論研究導論》課程時，講到《專書文獻學》的研究、撰寫問題。鄧聲國博士的《清代〈儀禮〉文獻研究》一書，實際上就是一部斷代專書文獻學著作，倘題為《清代〈儀禮〉文獻學》也行。可以說，除去研究《儀禮》的專家之外，對其他各種層次的學人而言，若要留心清代《儀禮》之學，能取該書一讀，大小大小，均當不無裨益，都能產生導讀、導研之類的功能。

當然，這部書也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。對初事整部學術著作的研究、撰寫的年輕學者來說，這往往是不可避免的。相信在今後的學術歲月中，倘有機會，不斷加以修改，定能日臻完善。

2005年10月7日，序于山東大學貴餘軒

凡 例

一、鑒于直至目前，學界對於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的研究仍然較爲粗疏，跟清代其他經學文獻的研究相比，無論是在研究的深度還是廣度方面，都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故本書嘗試着進行一次較爲全面的文獻詮釋性解讀，務使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的研究能夠向前邁進一大步，進而促進學界對這一類文獻的關注和研究。

二、對清代《儀禮》文獻的研究，牽涉範圍廣，內容衆多，歷史學、民俗學、人類文化學等不同學科學者皆可參與這一課題研究。本書主要從古典文獻學所涉相關方面入手，融個案研究與史論於一體，展開專題式的探討，籠括對清代各種《儀禮》文獻的研究，並爲今後《儀禮》文獻學的建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。爲幫助讀者大致瞭解清代《儀禮》學研究的發展概貌，從古籍整理的實際情況入手，本書前四章着重闡述了清代《儀禮》學研究中帶有全局性的一些問題，如學術分期及特點、流派研究以及其他各類詮釋中的相關問題，務使讀者對清人的治學特徵、治學主張等有所認知。考慮到“五服”研究在清代《儀禮》學研究中的重要性，故本書專闢一章進行介紹。另外，考慮到清代《儀禮》文獻中所涉訓詁、目錄、版本、校勘、辨僞、輯佚諸方面發展狀況各不相同，本書第六至第九章將逐一介紹這些內容，務使讀者對清代《儀禮》文獻學各要素學術發展的綫索有清晰把握。

三、本書所講的“訓詁”概論，與古代漢語中所講的略有不

同，不屬於語義學的範疇，而屬於解釋學的範疇，舉凡對《儀禮》及其二次、三次文獻的注釋都屬於本書所講的“訓詁”工作，字詞的解釋僅僅只是其工作方面之一，對儀制方面內容的詮釋更是《儀禮》訓詁的重中之重。其中所論“訓詁方法”、“訓詁體式”概念，同樣是從這一角度加以定稱的，並非簡單的釋詞體式研究，與一般訓詁學教材所討論的略有差異。本書論及文獻訓詁體式時，主要依據馮師浩非先生《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》及《中國訓詁學》二書，少數體式名稱（如“刪改體”之類）則係著者所創，非敢故意標新立異，俱以準確顯明該體式特徵為要歸。

四、本書所舉例證，大都經過精心選擇，務求切合所證論點之需，並力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。至于各條目下所舉例證之多寡，則依需要而定，力求避免孤例單證。

五、爲了行文簡便，本書凡援引《儀禮》十七篇經、《記》及《喪服傳》文，皆不注明文獻版本。另外，東漢鄭玄《儀禮注》、唐賈公彥《儀禮疏》等常見論著，稱謂時一般用簡稱，如稱鄭《注》、賈《疏》等。其他清人《儀禮》文獻，首見時舉其全稱，本節內復見時，在不存在指稱歧義的情況下，一般亦用簡稱。

六、囿于篇幅所限，凡清人《儀禮》文獻研究不具鮮明特色者，本書不復逐一介紹，亦無必要逐一介紹。凡曾經研覽而不記錄其文的《三禮》研究綜論性著作，若無必要，本書行文中亦不逐一交代，但求簡便而已。

七、凡引文所屬文獻出現次數較少，或不涉及《儀禮》研究內容者，均在腳注下兼注版本情況；至于論述中提及的清人《儀禮》文獻，及其他相關文獻重複出現次數較多者，則其相關版本信息參見本書《主要參考文獻》部分。各腳注中注明之引文卷、頁情況，除特別聲明外，皆係依據該參考文獻所注版本論著。特別需要交代的是，凡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續修

四庫全書》諸叢書版本文獻，其所注明之頁碼，均係該文獻所在當冊之頁碼，如注云“曹元弼：《禮經校釋》卷三，第 148 頁”，是指《禮經校釋》所在叢書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94 冊之第 148 頁，餘皆依此類推，惟影印本分列兩冊者，則附冊序。諸文獻所屬卷冊情況，一並參見本書《主要參考文獻》所載。

八、書後附錄凡二則：第一則附錄主要臚列清代《儀禮》佚著要目；第二則附錄主要臚列清人文集中的《儀禮》研究成果，借以反映清人的散佚研究成就，本書對這一部分散佚成果目前尚缺乏研究，亟待今後加以彌補。

九、本書寫作中參考了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，凡屬於今人研究中較為顯著的發明，著者在論述中必一一揭舉注明，以示不敢掠人之美。所參看的研究論文，皆隨引文逐一注明出處，參考文獻部分不再詳加羅列。

緒 言

《儀禮》是儒家傳習最早的典籍之一，相傳孔子即以其傳授弟子。該書內容較為特殊，記載我國古代的禮制儀式，以士禮為主，兼及其他。借助《儀禮》一書，可以考察我國先秦時期的宗法制度，瞭解各個社會階層的風俗習慣，從漢代以迄清末，儘管由于《儀禮》文古義奧，傳習者少，但對《儀禮》的研究仍代不乏人，從目前所知的情況看，歷代《儀禮》研究文獻約有 500 種之多，其中唐以前的研究文獻大致有 130 種左右。唐代大一統後，隨着賈公彥《儀禮注疏》的頒行，《儀禮》學定于一尊，當時的許多大學者包括古文學家韓愈也都苦其難讀，研究者較少。據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《通志·藝文略》記載，其時只有孟詵、王方慶、凌準、張薦、殷价、龐景昭、裴茝、仲子陵等，可惜他們的著作都没能流傳下來。宋代建立以後，根據《宋史·藝文志》等相關典籍記載，對《儀禮》一書的研究遠遠超過了唐朝，大約成書 50 餘種，出現了朱熹、陳祥道、楊復、李如圭、魏了翁等一批禮學家，形成了自漢代以來的第二次《儀禮》學研究熱潮，其中一些著作對後世《儀禮》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。元代方回、張須、吳澄、敖繼公、汪克寬、顧諒、葉起等人都有研究著作。明代出現的《儀禮》學著作近 70 種，有些已經亡佚或存佚不詳，總的說來，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很有限，學術上没能出現新的突破，對後世的影響不大。

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，清初諸儒者懲于晚明王學的流弊，倡導“以經學濟理學之窮”，致力于禮學的復興，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經學原典上來，“以禮代理”的學術思想開始萌芽，經過一批大儒的強力推動和親自實踐，至清代中葉遂風行于世，其後又經陳澧、黃以周等人的進一步推闡，“禮學即理學”的學術思想完全成熟定型，深深影響着當時的經學研究。另一方面，隨着社會局勢的逐漸穩定和清廷政權的漸趨鞏固，統治者對先進的漢文化也開始趨于認同，並逐步調整文化政策，通過開“博學鴻儒”、“經學特科”、設立三禮館、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等系列方法、手段，逐步恢復了中國幾千年崇儒重道的文化傳統。以上兩個方面因素彼此呼應，對傳統經學研究無疑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，促進了學術的蓬勃發展。立足于這樣一種大文化背景下，《儀禮》學的研究出現了蔚為大觀的學術態勢，以北方大儒張爾岐著《儀禮鄭注句讀》為端緒，稍後姚際恒著《儀禮通論》于南方，遙相呼應，揭開了整個清代《儀禮》研究的序幕。此後毛奇齡、李光坡、方苞、徐乾學、萬斯大、吳廷華、諸錦等一大批學者先後投身其中，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，出現了一大批以禮學名家的大儒。而胡培翬的《儀禮正義》更以其博大精深的治學取向和具體實踐，匯集了有清一代《儀禮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，將《儀禮》學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臺階，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清代《儀禮》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。受這種研究風氣的影響，直至清末，仍有一些學者，如鄭珍、曹元弼、俞樾等人，繼續致力于《儀禮》的研究，其中曹元弼的《禮經校釋》，誠為繼胡氏《正義》之後的又一力作。根據王鐸先生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》的統計，整個清代的《儀禮》研究著作超過了 200 部。由此可見，清代業已形成了《儀禮》學研究的第三次熱潮，而且是整個《儀禮》學研究史上的鼎盛時期。

總之，清代諸儒的《儀禮》研究，開闢了《儀禮》學研究的新局面，在有關《儀禮》文獻的訓詁、校勘、辨偽、輯佚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。從現行學科建設與將來學術發展的需要方面考慮，對有清一代《儀禮》文獻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，是擺在廣大禮學研究者面前一項重要的學術課題，但據著者所知，近百年來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少，是一個薄弱環節。對清朝《儀禮》的文獻進行研究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入手。本書打算從文獻學的角度進行研究，為今後撰寫《儀禮文獻學》一書打下堅實的基礎。

因此，著者力圖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通過具體的文獻研讀和考察，圍繞傳統文獻學研究的相關方面，以專題的形式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，全面剖析和揭示其真實面貌，為今後《儀禮》文獻學的建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，進而有效地指導各類《儀禮》文獻的具體研究，乃至推進整個禮學研究各個層面的深入發展。

馮浩菲先生曾提出專書文獻學的概念^①，《儀禮文獻學》即屬於專書文獻學範圍。本書以《清代〈儀禮〉文獻研究》為題，顯然離《儀禮文獻學》這樣一門專書文獻學還有很大一段距離，但這畢竟是學科構建的基礎性工作，這也是本人選取這樣一個研究課題的基本出發點。

為了論述方便，本書參考現代文獻計量學的有關理念，對歷代《儀禮》文獻進行了分級分類，即分成一次文獻、二次文獻、三次文獻、四次文獻等類目。具體地說，《儀禮》經文為一次文獻；二次文獻是指直接整理、注釋《儀禮》經文的著作，如鄭玄《儀禮

^① 馮浩菲：《試論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改革》，《文史哲》2002年第1期。